

这堵墙，让原本分裂的两极互相渗透、当场生效。”徐琰说。

达利曾自豪地宣称：“我与疯子的唯一区别在于，我没有疯。”

1929年是达利人生的又一个关键年份，他遇见了一生的挚爱与缪斯——加拉。这位比他年长十岁的女性，成为了他的女神，他的终身伴侣，也是他的经纪人。从此，他的签名常常是“Gala-Dalí”。他宣称“是加拉创造了我”——在本次展览中，这种深刻的情感连接也得以展现：展出的黄金首饰上，镌刻着二人的名字；而作品《国际象棋》的棋子更是直接用达利与加拉的手指翻模而成，成为他们爱情最独特的见证。

20世纪30年代，达利迎来了超现实主义创作的黄金时期，《记忆的永恒》等不朽杰作纷纷于此间诞生。二战后，他移居美国，更是开启了人生的另一幕大戏——将自己的艺术触角伸向电影、时尚、设计、广告等各个领域，成功地将“达利”这个名字打造成一个价值连城的品牌。

徐琰认为，达利之所以能与毕加索、马蒂斯并肩，成为“20世纪三大艺术巨匠之一”，就是因为——他把“梦境”变成了可以精确观看、可以传播、可以商业运作的“新现实”，彻底拓宽了艺术的功能边界。



上图：达利的超现实主义与百年老市府交融。

摄影 / 王哲

当达利遇见上海

如果达利来到今天的上海，他会做什么？

我猜，他绝不会只流连于美术馆、博物馆等艺术殿堂，他或许在抵达机场的磁悬浮上已经开始想办法让列车长出蝴蝶的翅膀；或许会把东方明珠想象成一根插着糖葫芦的巨大木棍开始作画；或许会在武康路上的“最美阳台”举办一场大秀，让模特们穿着龙虾或是水果形状的礼服；或许还会跟AI合作，生成一部关于未来上海的超现实主义电影……当然，他必然会带上一支专属摄影小分队，记录下他在上海的时时刻刻，犹如远道而来的世界知名KOL——他一定会爱上这里的繁华、活力和戏剧性。

“我觉得达利的超现实主义和上海的海派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海派文化本身就是兼容并包、开放包容的，它敢于把中西文化融合在一起，又喜欢创新和尝试

新事物；同时，海派也带有一点戏剧感和精致的叛逆——这种精致里有对美的追求，但叛逆里又有突破常规的勇气。”徐琰告诉《新民周刊》，“达利的作品里，荒诞、梦境、极致的想象力和对现实的重塑，正好和海派文化这种‘敢想、敢试、敢颠覆’的精神契合。在这里，他的超现实主义得以找到一个土壤：观众不仅能感受到他的梦境，也能感受到海派文化本身的开放与包容——所以这次展览，达利的精神和上海的城市性格其实在很多层面上是呼应的。”

曾经，达利在他生活的时代是富有争议的——“他太先锋、太高调、太会宣传自己。但到了今天，我们其实会发现，他是完全超前于时代的。”徐琰分析道，“他曾被认为‘太商业化’，但今天我们反而会看到另外一面：他把艺术带到更多领域——设计、时尚、电影、广告。扩大了艺术的范围。他非常早就意识到艺术家的公共形象本身就是作品的一部分。当年很多人不能接受，但现在的自媒体时代已经证明，他真正是一个‘商业的狂人、跨界的鬼才’。他是把人生当成艺术，把艺术当成生活。达利通过他的艺术作品告诉我们：他的一生就是一场艺术表演，他自己就是艺术。他把自己的生活，活成了极致的超现实主义作品。”